

五代回鶻史料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Redacted]

五代回鹘史料

〔法〕 J.R. 哈密顿 著
耿 昇 穆根来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乌鲁木齐

五代回鹘史料

〔法〕J.R·哈密顿 著

耿昇·穆根来 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书店总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190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统一书号：11098·30 定价：1.45元

译 者 的 话

《五代回鹘史料》法文原书名为 *Les Ouïghours à l'é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d'après les documents chinois*, 其作者是法国高等实验学院第四部研究员哈密顿 (James Rusell Hamilton) 教授。本书1955年作为法国中国高等研究所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 丛书第10卷而刊布, 由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 (*Presse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出版。

作者对所引汉籍的断句、分段及标点与我们现有的标点本并不太一致。为了忠于作者的原意, 我们尽量按照原法文断句、分段和标点。对于书中所引用的敦煌汉文写本, 我们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书中有关汉语和突厥一回鹘语的对音也完全是作者个人的考证, 我们也完全遵循作者的原义。对于卷末的索引, 我们只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突厥——回鹘语, 并将原书中作者的考订和对音摘录了出来。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多方面的帮助与指导。中央民族学院副教授、中国突厥学会负责人、我国著名的突厥学者耿世民同志热情地校对了译稿。他不但为我们解决了古突厥语, 而且还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史料翻译上的问题。在此谨向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 定有许多不足和欠妥之处, 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不胜感激。

1980年8月17日

于北京

BIBLIOTHE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VOLUME X

LES OUIGHOURS A L'EPOQUE DES CINQ DYN-
ASITES

D'APRES LES DOCUMENTS CHINOIS

PAR JAMES RUSSEL HAMILTON

PARIS, 1955

前 言

本书共包括四章。第一章是五代（907——960年）以前回鹘史的导论，并概述了一下有关九世纪在今甘肃和新疆境内建立的回鹘汗国的文献。第二章是对《旧五代史》、《五代史记》和《五代会要》中有关回鹘及其毗邻部族传记的译文和注释。这些毗邻部族包括突厥、吐蕃（同样也包括凉州、沙州和瓜州）和党项。第三章是对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第2992号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中三封书函的译文和注释，这三封书函是有关五代回鹘史问题的。第四章是总结，其中试将前三章中所引各种文献中的资料融汇贯通。在附录部分，我又对十世纪时用汉文拼写古代突厥语的规则进行了比较研究。

我在这里满腔激情地对戴密微先生深表谢意，他循循善诱地指导了我的工作。只是在他经常不断的鼓励和孜孜不倦的帮助下，本书才得以出版问世。我同样也向韩百诗先生、Ch·哈克诺埃先生、R·A·石泰安先生、R·吉扬先生和L·巴赞先生表示感谢，他们热情地帮助我撰写此书，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更对戴何都先生表示感激，承他的美意，本书才得以作为高等中国研究所的丛书而发表，他还不辞辛苦地阅读了全部清样，并对多处作了校对。同样，谨请所有那些曾经在工作中帮助和鼓励过我的朋友们和同事们也接受我的谢意。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导论：五代（907—960年）以前的回鹘史	2
第二章 回鹘及其毗邻部族列传	22
吐蕃传	23
回鹘传	65
突厥传	101
党项传	109
第三章 五代时期的三封书函	120
绪 言	120
第三封书函	121
第二封书函	126
第一封书函	128
第四章 汉籍五代（907—960年）回鹘史概要	131
后梁（907—923年）时期的回鹘人	132
甘州回鹘与后唐（923—936年）	135
后晋时期（936—947年）之西北地区	139
后汉（947—951）和后周（951—960年）时期	

之回鹘人.....	143
公元十世纪前回鹘可汗世系.....	145
甘州（今甘肃省）回鹘可汗世系.....	153

附 录

十世纪突厥语的汉文对音研究.....	155
汉文与突厥语转写对音表.....	186

参考书目:

汉语之外的其它语种出版物.....	193
汉文典籍.....	224
汉文——突厥——回鹘文译名对照表.....	228

导论：五代（907——960年）

以前的回鹘史

据汉文史料记载，回鹘族是古匈奴（即匈人）族的后裔。他们身材矮小，生性骄而残，擅长骑射，比其它任何民族都更为剽悍。在后魏时代（四——六世纪），由于他们所乘车的车轮高大，所以有人称他们为“高车部”^①。然而，回鹘族属于铁勒（敕勒）部落集团^②，至少在八世纪之前，中国是以此名称呼他们的。

回鹘人住地为蒙古高地的色楞格河流域，在薛延陀人牧地以北（而不是象沙畹所说的那样是在拔野古人地区以北，见《西突厥史料》，第89页）；《旧唐书》第195卷，第1页内提了东突厥（Kök—Türk）人，自从东突厥汗国建立以来，他们就利用回鹘人来治理位于新的疆域的不毛之地。

在东突厥汗国存在的整个时期（从六世纪中叶到742年），

^① 据说，蒙古人时至今日在涉渡因暴雨而横溢的河流时还使用这种具有双轮的高车。参看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3卷，第256页。

② 《唐书》，第217卷，第1页中列举了组成勒联盟的十五个部落的名称。我们似乎可以从其中解读出下列部族的名称：

一、袁纥 (Uiyur)。其它地方有时也拼写为“乌护” (Uyuy?)，“乌纥” (Uyur?)，在隋代是“韦纥” (Uiyur?)。

二、薛延陀 (Sjir—Tarduš)。有关这一特殊的拼写法，请参阅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3卷，第351页。

四、都播或都波 (Tuba/Tupa)。参阅F·W·K米勒：《Maḥrnamag》，第32页。也请阅读L·李盖提的看法，见《高地亚洲文明简释》，载匈牙利《东方文献》，第1卷，第1期，1950年，第174页和第175页。

五、骨力鞞 (Qurigan/Qorigan)。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314页；伯希和与韩百诗：《圣武亲征录》，第1卷，第63—64页和第7页。

六、多览葛 (Tälängüt) 为“多滥” (Täläng) 的复数形式。参阅沙畹上引书，第88页；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札记》，第142页。

七、仆骨 (Bugut) 为“仆固” (Bugu) 的复数形式。参阅H·W·贝利：《钢和泰藏卷考释》，载《大亚细亚杂志》，第2卷，第1期，第18页。

八、拔野古或拔曳固 (Bayirgu/Bayargu)。由于汉文在转写时误将字母易位而成了“Baryagu”，所以伯希和曾提议（同上引书，第187页注释）把“Bayargu”以通常的惯例而读作“Bayirgu”。

九、同罗 (Toŋra)。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88页。

十、“浑” (Xun/Qun)。参阅沙畹上引书，第88页。尤其请参看伯希和的意见，《论库蛮族人的问题》，载1920年《亚细亚学报》第133页以下；伯希和与韩百诗所著：《圣武亲征录》，第1卷，第110页。有一和阗文文献也记载了“浑” (Hüna)，见H·W·贝利：《有关甘肃突厥人的和阗文文献》，载《大亚细亚杂志》，第1卷，第1期，第48页)。突厥语“qun”字具有“力量”之意（参阅格隆贝奇：《库曼语辞典》），似为库蛮一名的主要成份。关于“Qu/Qun”，请参阅L·巴赞：《拓跋语考》，载《通报》第39卷，第255页。

十一、思结 (Siyir/Siqir)。参阅H·W·贝利于《大亚细亚杂志》第2卷，第1期，第19页中发表的文章。

十二，奚结 (Ayyir?)。突厥语 Ayyir/aḍyir 意为“公马”（参阅阿塔赖：《突厥语大辞典》一书的索引部分）。

回鹘人就同突厥人休戚相关，他们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尽管回鹘人臣服于突厥人，但我们仍发现他们在长时间内仍不屈不挠地反抗突厥人的统治，尤其是他们在七世纪经常和汉人站在一起而与突厥人及其盟友们分庭抗礼。

从公元741年起，拔悉密人、葛逻禄人和回鹘人采取了一致的联合行动，终于一举摧毁了东突厥汗国。然而，我们又发现回鹘人从公元745年起猛然崛起，他们的力量已大大超越了他们的同盟者，因而也就一跃而为已征服地区的唯一主人，而拔悉密人和一部分葛逻禄人则退居于纯粹的从属地位了。据《唐书》记载，九姓回鹘与拔悉密和葛逻禄人共同组成了一个民族，号称“十一部落”。至于“九姓回鹘”一词，它可能是指突厥文碑文中的“九姓乌古斯”（Toquz、Oγuz）。这一民族和中世纪的伊斯兰文献中所提及的托古斯古斯（Toghuzghuz）在突厥和回鹘汗国中居于显要地位，托古兹古兹的疆界与回鹘领土相当^③。

由回鹘人在东突厥汗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汗国，在蒙古地区从745年起一直存在到840年，于840年被黠戛斯人所推翻。回鹘汗国的开国可汗自称为骨咄禄毗伽阙（Qutluγ Bilgä Kül），他所统治的地盘东从满洲开始一直向西延伸到阿尔泰山和天山的葛逻禄人地区。该汗国的首府叫作斡耳朵—八里（Ordu Balıq），（即“王都”之意），位于鄂尔浑河流域，即原东突

十三、阿跌（Ädri），有时也作“訶啞”、“蹠跌”、“阿跋”、“阿拔”等。正如如沙畹（同上引书，第88页）所指出的那样，这最后两种形式似乎是用来拼写Apar一名的。

③ 然而，在西耐乌苏（šine—Usu）碑文中，第一位回鹘可汗同时还提到过九姓乌古斯和十姓回鹘（参看拉姆斯戴德于1913年在《芬兰——乌格爾学会会刊》第30卷中发表的《两篇回鹘鲁尼文碑文》一文，北侧碑文第1、3行。

有关对九姓回鹘这个复杂问题的考证，请参阅米诺尔斯基，《塔明·伊本·巴赫尔在回鹘人地区的游记》，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通报》，第12卷，第285页以下；《世界境域志》，第265页以下，也请参阅R·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62页以下。

根据《旧唐书》第195卷，第2页和《唐书》第252卷上，第2页中的汉语转写对音，我们可以对九姓回鹘之中的某些氏族名称考证如下：

一、药罗葛。根据高本汉的《汉语语法》，七世纪时的发音为“iak—la—kât”，根据罗常培于1933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特刊号，第12册中发表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一文的分析，在十世纪的发音应该是“yar—la—kâr”。药罗葛是对回鹘一姓“Yaylaqar”的汉语对音。请参阅伯希和：《论库蛮族人的问题》，载《亚细亚学报》，1920年，第142页注释；亨宁：《焉耆语和“吐火罗语”》，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通报》，第9卷，第555页；H·W·贝利：《钢和泰藏杂卷考释》，载《大亚细亚学报》，第2卷，第1期，第16页和第17页。两唐书还具体阐明了药罗葛是王家部族，即可汗部族。另外，在十和十一世纪时，甘州回鹘可汗的名字中还带有药罗葛的姓。所以，《宋史》第490卷，第13页记载，沙州和甘州的回鹘可汗在980年还叫作“夜落纒密礼遏”〔十世纪时的对音为ia—lay—xor mbir—le—âr〕，即为Ya (y) laqar Bilgā。在1015年和稍后的几年中，甘州回鹘的数位可汗都称为“夜落隔”（十世纪的对音是“ia—lay—key”，参阅《宋史》第490卷，第15—16页），这也可能是对同一药罗葛族的转写，因为在当时结尾字母已不再发音了）。

二、胡咄葛。这似乎是“Uturqar”的汉语对音。这种转写形式可以和以下突厥部族的名称相比较：乌图尔古尔〔Outourgour（参阅R·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24—125页）〕，乌蒂盖尔（Utiger，据拉施特（Ra—Chidu—’d—Din）的看法，这是十姓回鹘之一。参阅格勒纳尔：《有关萨土克布格拉汗的传说和历史》，见《亚细亚学报》，1900年，第17页注释〕，乌蒂古尔（Outigour，沙畹：《西突厥史料》第240页）等。在古突厥语中，动词“ut—”是“战胜”和“追随”的意思，“uru—r—”是“对立”的意思。后缀“—yar”、“—yi”、“—yur”似乎一般都用来组成不定过去时分词（参阅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札记》，第288页以下）。

三、咄（囉）罗勿。亨宁（同上引文，第555页）曾将第一个字改成了“屈”，这样就可以复原成突厥语“Küräbir”。也请参阅H·W·贝利于《大亚细亚杂志》第1卷，第1期，第49页和第2卷，第1期，第19页发表的文章。

四、𧑦歌息讫。亨宁（同上引文，第555页）复原为“Boqsigit”，并认为与和阗文中的“bäsikätti”〔但是，难道“bäsikätti”不是著名的巴只吉惕（Başyirt）部族吗？〕是同一名称。有关这一对音问题，我认为更有可能是指“Boqasiqir”。“Boqa”意为“公牛”，而“Siyir”则为“母牛”。“Siqir/Siyir”（即“思结”）是另外一个突厥部落的名称〔参阅上文第2页注①（原文为第1页注释②）〕。

五、阿勿喃（《唐书》的写法是“阿勿喃”）。大致就相当于“avu čay”。古兹（yuzz）的部落之一叫作avšar（参阅伯希和：《金帐汗国史札记》，第192—194页。“—tsây”一般确实是很难对成尾音šar”。但在放弃“Avar”一译法之前，我们应该重新考证一下“喃”（tsây）的读音或读作“喃”？我认为这样做很不可靠。

六、葛萨。伯希和先生（同上引书，第208—209页）利用哈扎尔（Hazar）民族的名称“Qasar”来解释这种转写法。然而，伯希和先生得出的结论是“qasar”并不是“qarsar”，因为他把“葛”字的古代发音复原为“kâ”而不是“kât”，我认为他在这一点上误解了。另外，汉语中的“—rs—”或“—ts—”完全可以对成“—č—”，这样，本名词就可以复原为“Qačsar”，伯希和先生认为哈扎尔一词即起源于此，我认为“—rs—”或“—ts—”还可以用来对与其近似的“—z—”，即将本名词复原成“Qazar”（也请参阅下面一段）。

七、斛唃素。我认为它是指著名的部族乌古斯（Uyuz），而且我还认为“素”完全可以对“—z—”（参阅下面一段）。

八、药勿葛。亨宁（同上引文，第557页）复原成“Yabutqar”或“Ybütkar”，而且意欲同和阗文的“Yabütikari”和突厥语的“Yamuqar”相比较。

九、奚耶勿。亨宁（《焉耆语和“吐火罗语”》，载《东方和非洲研究院通报》，第9卷，第556页）把它复原成“Ayavir”，也请参阅贝利于《大亚细亚杂志》，第1卷，第1期，第49页发表的文章。“爱邪勿”是842年一位回鹘宰相的名字（参阅《资治通鉴》，第246卷，第19页）。

厥旧都的废墟上，也即今哈喇巴勒哈逊。

回鹘人历来都同汉人友好睦邻。在突厥时代，我们发现汉族皇帝经常借用他们的部队；他们甚至还同意加入汉族政权。公元757年，在唐朝由于安禄山叛乱所引起的战祸中，回鹘人派遣骑兵部队援助肃宗皇帝平叛，这就暂时缓和了威胁唐朝生存的深重灾难。然而，我们还要指出，当时的回鹘可汗磨延啜（可能为 Bagan čor 的对音）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出兵相救唐朝皇帝，那是因为后者曾许诺在告捷之日将给予重赏。公元762年，回鹘的一位新可汗也曾应唐代宗的请求而出兵相救。这一次不但最终彻底粉碎了叛乱势力，而且还为唐朝收复了东都洛阳；同时，他们也将城池洗劫一空，满载而去，从而得到了报赏。但是，唐朝虽然认为回鹘人在这两次驰兵相救时也是瑕瑜互见，但仍对他们感恩不尽。

5 然而，就以这两次事件为起始点，在回鹘汗国于840年灭亡之前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回鹘人就以唐朝的大盟友和保护者自居，对待已经处于衰微破败阶段的唐朝的态度十分骄横跋扈。当时唐朝皇帝四面受敌，因此他们确实有求于保护人的地方；回鹘人也确实为唐朝效过大力，尤其是在反击正处于全盛时期的吐蕃的军事威胁中更为如此。但常常又是每当唐朝向回鹘求援时，回鹘人也正处于自身难保的内乱中，由于被国内事务纠缠得焦头烂额，他们无论如何也是推三阻四，不肯痛痛快快地出兵慷慨相助。另一方面，每一位新可汗都百般恳求与一位唐朝公主婚配以提高自己的威望，而在大部分情况下，唐朝政府都不敢推诿而得罪他们。在唐朝与藩属民族和亲的所有公主中，只有三位真正是皇帝生女，而且又全都婚配了回鹘可汗^①。这些回鹘可汗就借口这种联姻关系和结盟的地位要求与唐朝皇帝平起平坐，而从汉人的感情来看，这是一种不堪忍

受的冒犯。

然而，汉人也经常特别尖锐地责备回鹘人欺人太甚。主要是唐朝每年都需用大量丝绸来换取回鹘人的马匹，这是一种所谓的“交换”方法，而唐朝的盟友们又经常强迫他们从事这种交换，因而就完全变成了一种变相的纳贡。另外，在回鹘可汗的保护下，回鹘人在唐朝各大都市都建立商人居留区，而这些商人又享有许多特权。后最，由于回鹘人都是虔诚的摩尼教徒，为了在唐朝传播他们的信仰，这些回鹘人在唐朝土地上修建了许多寺庙、建立了许多摩尼教教会。回鹘人这些不遗余力的活动引起了唐朝社会各主要阶层对他们强烈的敌对情绪，这种感情在宗教界和爱国界人士中更为明显，因为他们很难允许在汉人之中引入一种外来的、由胡人保护的宗教信仰。因此，我们就会明白，一旦时机成熟，汉人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凌侮或拮据他们的盟友。

有关回鹘人信仰摩尼教问题，我们通过回鹘汗国的故都（即哈喇巴勒哈逊）发掘出来的碑文得知，当牟羽（可能为“Bögü”的对音）可汗于762——763年之间在洛阳城（见上文）停留时，曾与一些摩尼教信徒建立了联系，并把他们带回到了首都斡耳朵八里，后者很有可能都是粟特人。碑文中把这位可汗（759——779年执政）称为“泥法师妙达明门”，是他把摩尼教传入了回鹘人之中。由于官方的支持和积极的传教活动，摩尼教很快就变成了整个回鹘汗国的国教。随着这种新教变成国教，僧侣们的政治势力很快就变得相当强大了。当时的汉籍都记载了摩尼教僧侣在可汗面前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可汗在政事方面往往要由他们参决，甚至还要委派他们作为使节出

① 参阅邝平樟：《唐代公主和亲考》，载燕京大学历史学会出版的《史学年报》，第2卷，第2期，1935年9月北京版，第23——60页。也请参阅戴密微：《拉萨宗教会议僧净记》，第6页。

使唐朝。

摩尼教对促进回鹘文明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个未开化的、能征善战的民族通过这种古老的波斯宗教而接触到了伊朗和地中海社会中敏捷的思想和精致的艺术，因为摩尼教综合了基督教、祆教和佛教的各种因素。在吐鲁番地区进行的考古发掘证明，回鹘人从九世纪起就已经具有高度的文明了，我们通过其它地方还得知，随着回鹘人文明的大幅度地发展，在十三世纪之前，他们确实堪称其它突厥 - 蒙古民族的文明先驱。来自粟特地区的摩尼教传教者们可能还在回鹘民族中传播了两种以粟特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这就是用于书写经文的摩尼文和所谓的回鹘文。回鹘文虽不及古突厥文那样适宜记载回鹘语，然而它却在数世纪中充当了古突厥民族文学的书写工具。

另外，粟特人在回鹘文化和人种学的发展方面确实曾起过巨大作用。粟特是伊朗民族的一支，是一个长于经商的部族，他们在唐代以前就大批沿着通商大道迁徙到中国的西北边陲定居。我们还发现粟特人在后期又大量地聚集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回鹘京都，其目的无疑是为了从事贸易或传播摩尼教。所以，回鹘人在八、九世纪间深深地受到了粟特文明的影响（考阅浦立本：《内蒙古地区的粟特人聚落》，载《通报》第41卷）。例如，我们可以在一些有关十世纪回鹘人的文献中发现有近一半的回鹘人都具有居住在汉族地区的粟特人的典型姓名。从832年开始，回鹘汗国由于严重的骚乱而开始黯淡了。在840年之前，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些阴谋活动和暗杀事件，国家的各级机构都遭到了瓦解，一位反叛的回鹘首领向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人求援以反抗可汗。黠戛斯人原是一种未开化的突厥人种，他们突然间在西北部崛起并拥有十万名强悍的骑兵。他们长驱直入，一举攻破回鹘首都，杀戮了可汗，并将城池化为灰烬。

回鹘部族惊慌失措，四处溃散逃亡。有的向西逃到了葛逻禄人的领土境内，有的向西南逃到了吐蕃人境内，有的向南流窜到了唐朝的边塞地区。鄂尔浑河流域的回鹘汗国就这样土崩瓦解了。

7 南下到唐朝边境地区的“可汗牙帐附近的”十三部没有在那里找到避难地。相反，当汉人一旦确信回鹘势力已最后衰败时，他们就追逐甚至要灭绝自己昔日的盟友，这些盟友过去曾给汉人造成了无尽的恐惧和具大的灾难。在汉人和黠戛斯人连续不断的夹攻下，回鹘的势力越来越弱小了，这十三部在饥寒交迫中徘徊流浪，苟延残喘，一直到848年，他们的残余势力才最后被驱散。

至于逃窜到西部和西南部的十五部，他们在中亚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众所周知，在五代时期（907—960年），回鹘人主要是集聚在两个中心地区：其一是甘州，即今甘肃省的张掖县；另外一处就是西州^①，即今新疆吐鲁番附近的哈喇和卓，在那里，回鹘文明于九—十二世纪大放异彩。然而，我们对于回鹘民族在汗国崩溃之后，是如何历尽艰险才最后得以在这些地方落脚的具体过程仍若明若暗；对于他们的历史概况，尤其是他们在五代以前与附近其它部族的关系更为模糊。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几部汉文史书对此问题的记载重新进行研究和考证。

我们在《旧唐书》第195卷第9页中可以读到，当黠戛斯人于840年夺取回鹘首都时“有回鹘相驳职^②者，拥外甥庞特

① 有关唐代西州的历史和体制状况，请参阅马伯乐：《斯坦因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一书，第84页以下。

② 我认为回鹘相驳职（十世纪汉语读音为Saβ—tsiy）¹的名字可能为突厥语“sabčī/savčī”的对音，其意为“传信人”或“中间人”，由突厥语“sab/sav”（即“话语”）派生而来。在《Mahrnâmag》一书中所列举的大人物中，也有一位叫作“Sabčī Maya Tarqan ügä”（参阅F·W·K·米勒：《Mahrnâmag》，第9页）。我们这一拼写法中的结尾字母“-r”明显是多余的。罗常培于1933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册中发表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一文中指出，“职”的脚韵“-γ”在当时正趋于脱落。